短論‧觀察‧隨筆

文化研究學者 伊斯拉莫格羅教授訪談

● 徐志偉

伊斯拉莫格羅 (Huricihan Islamoglu),當代土耳其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,現為伊斯坦布爾大學教授。她關於全球化政治、經濟、法律問題的研究,曾引起世界性的反響。

徐志偉: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邀請。我個人對於土耳其知識界的狀況還不夠熟悉,所以請原諒我對您的無知。您能否簡單地介紹一下您的個人經歷?

伊斯拉莫格羅:我1947年出生於土耳 其伊斯坦布爾,1965年赴美留學,先 後就讀於芝加哥大學、威斯康星大 學,主修經濟學,1979年獲得威斯康 星大學博士學位。畢業之後,我曾在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,八年 後我回到了土耳其。1990至1996年, 我在安卡拉的中東技術大學任教; 1997年去了德國,在一個研究所任 教;1998年,在紐約大學任教;自 2000年開始,我在伊斯坦布爾大學任 教;同時,還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 利分校兼職。 除了經濟學以外,我也認真研讀 過歷史學。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 分校任教期間,我曾組織召開過一個 研討中國清史的國際會議。我現在正 在寫一篇與清史有關的文章,其主旨 是:如何理解我們的現代性。在西 方,現代性通常被描述為單一的、 題的。但在研究中國的清帝國時,我 開始意識到,現代性並非像西方人所 敍述的那樣,可以脫離歷史而存在。 事實上,歷史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。 現代性應該是基於歷史的、多面的。

徐志偉:能否再介紹一下您目前的研究領域?

伊斯拉莫格羅:1990年代,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解體之後,我開始關注 私有制問題,做了有關十九世紀私有

*本文係根據徐志偉在亞洲文化研究上海年會(2007年6月15至17日)上對伊斯拉莫格羅教授的採訪錄音整理而成,文中的主要內容已經伊斯拉莫格羅教授審閱。



伊斯拉莫格羅教授

制問題的三項研究,並且組織了與此相關的學術會議。「私有制」意味着甚麼?很多人會認為這是經濟學家探討的問題,但我並不這樣認為。我認為「私有制」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,還是個政治問題。基於這個認識,我更關注國家和政府層面的改革,以及經濟變化所帶來的種種社會現象。

我對社會主義改革很感興趣。通 過對蘇聯解體之後不同國家的改革方 式以及新的管理方式的研究,我分析 了社會主義的變化。當然,這些研究 與我對十九世紀私有制的研究是並行 不悖的。在十九世紀產生的國家市場 經濟,不同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全球 市場經濟。十九世紀,伴隨着國家市 場經濟的出現,中央集權開始產生。 社會主義的模型與中央集權有着密切 的關係。斯大林是政治上的社會主義 者,但我只能説他在某些方面堅持了 馬克思主義,他的很多主張都與經濟 有關,與政治有關聯的則很少。

事實上,政治、經濟與文化緊密 相聯,我們不能把經濟與其他因素分 離開。如果人們過多地關注經濟,就 容易忘記文化、政治。誠然,不了解 經濟就無法全面了解整個社會,但 是,僅僅了解經濟學本身也無法對社 會有整體的印象,所以我們應該把社 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,這點是相當 重要的。當然,要做到全面是很不容 易的,當人們想要全面談論社會的時 候,很容易失之於表面化。我認為我 們應當做的是,先弄清社會的不同部 分,然後再對社會做整體的考慮。

徐志偉:「鄉村問題與文化研究」是本次亞洲文化研究上海年會的一個重要主題,作為唯一受邀的土耳其學者,您對這一主題有何評價?

伊斯拉莫格羅:這次會議將農村問題 和文化研究相關聯,是一個很健康的 轉變。在美國,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一 個封閉的領域,愈來愈學院化和小圈 子化,談論的話題也愈來愈狹窄、無 聊。我認為這次會議對於文化研究而 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。

農村問題在今天的亞洲尤其重要。我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關於農村問題的。我試圖想要解釋的是:非合作農民、小商人出現的原因。非合作農民、小商人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存在的一種現象。很多人認為農民之間不合作會減少農產品的產量,這是小農經濟,它不夠激進,沒有效率,我們應該像加利福尼亞州所做的那樣,用大機器作業。但我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或世界銀行的想法。我要指出的是,這樣的想法是不合時宜的。小農經濟不應該馬上消失,因為這種經濟能夠使廣大農民活下來。我們要看到小農經濟應該長期存在的必要性。

徐志偉:能否介紹一下文化研究在土 耳其興起的語境及開展的狀況?

伊斯拉莫格羅:在土耳其,文化研究 並非顯學,關注的人不多,目前只有 兩所私立大學開設這門課程。土耳其 的文化研究者特別關注身份政治問 題,比如種族劃分、民族主義等等。 民族主義很重要,這一點經常為歐洲 國家所強調,因為歐洲的政策傾向於 用種族劃分來對待國家,但我不認為 這樣做總是正確的。我們從南斯拉夫 的情況可以看出這一點。尊重不同的 民族是很重要的,但過份強調種族性 是相當危險的。事實上,要每一個民 族、種族都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,既 無必要,也無可能。在同一塊土地上, 國家愈多,發生戰爭的潛在性危險就 愈大,這就是在南斯拉夫發生的狀 況。這樣說並不代表我反對民族主 義;相反,我認為強調種族群體的自 主性是很重要的,因為在今天,很多 國家都存在着民族問題,比如俄羅 斯,比如中國。但這種強調的指向不 一定是獨立的國家。土耳其的文化研 究着眼於種族問題,有它自身的價值。

徐志**偉**:作為一個經濟學家,您如何 看待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關係?

伊斯拉莫格羅:這個問題有點難答。 在我前面說過,經濟學家也要思考文 化問題,文化與經濟是聯為一體的。 所以,我不獨立地看文化。我對於 「文化」的定義是:一個社會自己的習 慣、自己思考的方式和自己看待生活 和世界的方式。文化是有歷史性的, 是不同的獨立個體的共享經驗。比如 中國,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人們的一個 共享的經驗,社會主義在這裏不被抵 制。但在東歐的情況卻很令人沮喪, 那裏的人們抵制他們過去曾經歷過的 社會主義,拒絕共享社會主義經驗。 我認為,共享經驗是很重要的,我們 正是通過共享經驗,去推動經濟。

每個國家都通過他們共有的經驗來應用某種發展模式,這些共有的經驗就是文化。文化體現在人們行為方式的細節上,我曾觀察過不同國家的人們用餐時的情境。在美國或者歐洲國家,人們用餐的時候彼此之間不願意挨得太近,而在中國,人們喜歡坐在一起用餐。對我而言,這就是文化的某種體現,因為這是人們做事的一種方式,是人們接近事物的一種方式。正是這些不同的方式,決定了不同的國家會採用不同的發展模式。所以,我們要把經濟、文化、政治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,不能拆開。

徐志偉:中國晚清時期的著名思想家 梁啟超曾經寫過一篇題為〈中國與土 耳其之異〉的文章,他認為土耳其在 現代轉型中失去了自己的「國性」,您 認同這樣的觀點嗎?

總之, 土耳其人不喜歡他們自己, 他們甚至恨自己是土耳其人。這一點與中國人不同, 我發現很多中國

120 短論·觀察· 隨筆 人都有一種民族自豪感。也許是因為 土耳其人在戰爭中失敗了,失去了自 己的帝國,總感覺自身有很大的問題。土耳其人丢失了自己,身份變得 模糊。但近些年,我發現了一個有趣 的轉變,許多土耳其人開始選擇放棄 去歐洲工作,把目光投向印度、泰國 和中國。我從伊斯坦布爾到中國很方 便,在北京和伊斯坦布爾之間每天都 有直航航班。許多土耳其人願意到中 國,或者去印度,因為他們在中國或 者印度要比在歐洲生活得舒服。

徐志偉:您期望土耳其成為一個甚麼 樣的國家?

伊斯拉莫格羅:我希望土耳其能在東 西方之間找到自己的定位。不但要和 西方建立關係,也要和東方——尤其 是和伊斯蘭教國家、俄羅斯、哈薩克 斯坦等國——建立關係,在地區事務 中發揮自己的作用。近些年,我看到 了土耳其有了非常健康的轉變,開始 和伊朗、俄羅斯建立了良好的關係。 以前土耳其和俄羅斯由於冷戰的原 因,關係很糟,現在則有了極大的改 善。土耳其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 國有大量的投資,在這個地區的經濟 活動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,尤其是 建築業;甚至可以説,土耳其正在參 與俄羅斯和中亞的重建。土耳其的經 濟實力在該地區是不可忽視的。在文 化層面,土耳其也不再閉鎖,土耳其 目前正在對伊斯蘭教國家開放,這種 開放是史無前例的。我個人認為這是 一種非常積極的轉變。

徐志偉:您對中國知識界的狀況了解 多嗎?你怎麼樣看待當前這種「第三 世界」國家知識份子之間相互不了解 的狀況? 「第三世界|國家知識份子之間的 確存在着相互不了解的狀況,我認為 這是有問題的。「第三世界|國家知識 份子之間需要加強交流,我們不能把 眼光只盯着歐洲和美國。在對世界問 題的思考上,中國的經驗應該加入, 土耳其的經驗也需要加入,其他國家 的經驗也應該加入。我們正在伊斯坦 布爾着手建立一個用於研究中國的研 究中心。我們計劃邀請一些中國學者 來這個中心,通過這種方式加強交 流。全球化,一方面説來是具有破壞 性的,另一方面説來也是有積極意義 的,它可以使不同國家的學者坐在一 起。我們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這個便 利來展開對話、加強聯繫,從而試圖 去建立新的社區——亞洲人的社區。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徐志偉:再次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。

伊斯拉莫格羅:也謝謝你的提問。

徐志偉 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